

■ 学人素描

莱维特：用经济学方法透视社会万象



莱维特现为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家教授，曾在2003年获得过拉克拉克奖，被称为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作为实证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把经济计量方法成功地运用到通常认为难以进行实证检验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如青少年犯罪成因、选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和甄别作弊行为的机制等。他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像是一颗苹果，用经济学的剖刀切开，里头竟然是橘子。

◎ 史晨昱

2005年5月，一本名为《魔鬼经济学》(也有翻作《苹果橘子经济学》)的著作在美国问世，果然引发了“魔鬼”效应，该书曾以31国语言出版，在美国更是狂销900,000册，持续47周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这是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写出的经管奇书。作者就是有着“全美最有趣大脑”之誉的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1967年出生的莱维特，哈佛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家教授，被称为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

莱维特长得弱不禁风，他自称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但他的学问却独树一帜，赢得了同行的足够尊重。莱维特获奖无数，其中包括2003年美国克拉拉克奖。

作为实证经济学家，莱维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经济计量方法成功地运用到这些通常认为难以进行实证检验的社会现象中。他更像聪明而好奇的探险家，擅长于发现问题的关键特征，并寻找新数据和构造新方法。他还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把文章取材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用经济学方法解释青少年犯罪成因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犯罪率一路高涨。法学、社会学、生理学等学科倾向于从道德角度把犯罪人看成是异常人，把犯罪的成因归结为罪犯的心理、遗传特性及社会环境。他们认为青少年罪犯没有道德观念，冷酷无情，犯罪没有明确的动机，不考虑作恶可能导致的惩罚。

1998年，莱维特在《青少年犯罪与刑事处罚》一文中，运用以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偏好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来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他认为，青少年罪犯也是完全具备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会仔细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谋求利益最大化。莱维特验证了1978年至1993年间美国青少年犯罪数量与青少年司法系统处罚力

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强相关性。

2000年，莱维特在《街头贩毒团伙财务状况分析》中，分析并检验了青少年参与贩毒行为的“收益最大化”权衡。他发现，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来说，贩毒团伙提供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他们从事合法工作的收入，因此贩毒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然而，贩毒团伙中低级成员的收入要低于其从事合法活动的收入，且承担风险高，似乎得不偿失。莱维特认为，这并不违背“收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低级成员可兼作一些临时性合法工作而获得较高的总收入；另一方面，团伙头目的高收入水平成为低级成员努力工作的激励和目标。据此，莱维特的政策建议是，干预劳动力市场，增加合法收入的吸引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犯罪率一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令犯罪研究专家们大跌眼镜。莱维特直言，最高法院于1973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才是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关键所在。他的逻辑是，选择堕胎的少女往往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成长环境，如果强迫她们生下孩子，那么孩子成长环境很可能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堕胎合法化使得这些潜在的罪犯胎死腹中。在其详尽有力的数据面前，美国学界信服了。

选举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解析美国选举制度影响

美国国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还有批准联邦预算，各个常设委员会则掌握着联邦财政分配权。大多数研究认为，国会议员会尽力为其所代表的州谋取经济利益。但议员们怎样对其所代表的州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资历”说，认为在常设委员会或本党的资深议员能够左右政策制订，将经济利益分配至他所代表的州。另一种是“委员会”说，认为委员会中的多数党则实际掌握了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莱维特在1994年发表的《议员制度和州经济增长》一文研究了这些问题。莱维特认为，以上两个因素是同

时、独立发挥作用的，此外议会中的多数党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除了影响联邦经费的分配以外，更重要的是议员们还可以通过制订或废止一项法律、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来影响各州的经济增长。

议员们出于什么目的来支持其所代表的州的经济增长呢？普遍认为，更多的联邦政府财政分配会取悦选民，帮助在任的议员赢得连任。但一直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莱维特1997年发表的《联邦财政分配对议员选举结果的影响》对此做了准确的度量。莱维特把联邦经费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农业、交通、环境、特殊教育等进行的“非转移支付”；另一类称为“转移支付”。主要有国家安全、医疗保健、低收入者住房补贴、退伍士兵补助等。莱维特的检验表明，非转移支付对帮助在任议员赢得竞选的贡献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一个选区中人均100美元的增量将帮助在任议员赢得2%的选票；而非转移支付与在任议员竞选结果没有显著的关系。莱维特的检验结果证实了人们的推测，在任议员在选举中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为在任议员争取到5%至9.5%的选票。这也说明了美国每次国会选举中只有不到5%的议员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这一现象。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莱维特在1994年发表的《候选人相同的竞选来估计竞选花费对美国众议员选举的影响》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经过检验，莱维特发现，不论是挑战者还是在任者的竞选花费，对竞选结果几乎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又怎样解释庞大的竞选花费呢？莱维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与竞选成功的收益相比，筹措竞选经费的机会成本非常小，所以即使竞选花费效果不大，因为钱来得容易，多花一些钱也无所谓。

甄别作弊行为的机制：做出开创性贡献

几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各州对中、小学三至八年的学生进行统一考试以测试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且据此考察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些州还规定据此对表现出色的教师进行奖励。

学界认为，这种考试一方面会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激励，但他们担心这种考试会使教学变成应试教育，并且使一些教师为达到标准而进行作弊。这种担心终究是一种猜测，最终结果要靠事实和数据来证明。莱维特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2003年的两篇工作文稿《烂苹果：对教师作弊普遍性及预示指标的研究》、《抓住作弊者：理论应用试验的结果》中，莱维特构造了一种方法使人们能判断是否存在教师作弊行为及作弊的普遍程度。

教师作弊手段可谓多种多样，如可以事前分析考试规律，围绕考试内容来授课。莱维特认为最不道德的手

段是教师、校长及学监串通在考试中作弊，比如延长考试时间、放松考场纪律，甚至篡改学生答题结果。莱维特认为如果教师采用后一种手段进行作弊肯定会在学生的答案中留下一些线索。

他认为如果一个班级存在作弊行为，那么会有三个显著特点：(1)作弊当年考试成绩优异；(2)作弊发生的次年成绩显著下降；(3)学生答案分布异常。从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出发，他设计出甄别教师作弊的两组指标，一是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二是学生答案的异常分布。

考试成绩的异常波动可以得到精确的数据，但答案异常分布的测量则困难得多。首先，莱维特分析了确定作弊行为的考试中学生的答案分布情况，以此作为测度的基准，然后用四个指标来测试不同作弊手法对答案分布的影响：(1)一个班中一组相连续的问题答案的异常地趋同，这说明教师的作弊手法初级；(2)班级之间学生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如果教师随机更改答案，那么这个班级答案的总体相关程度将会提高；(3)一个班级中的学生对不同问题答案的相关程度。如果

学生对有一些问题的答案高度一致，而对其他问题的答案则平均分布，说明教师有可能更改了一些特定问题的答案；(4)不同班级间学生对不同难度问题答案的差异。对于不同班级中得分相同的学生来说，如果简单的问题回答错了，但困难的问题却回答对了，说明其中有教师作弊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班级成绩波动幅度大，但答案分布差异不大，说明教师没有作弊；如果这两个指标的差异都比较大，则有可能出现教师作弊。

莱维特没有像其他“学院派”学者那样，局限在高深的数据、模型、理论建构里打转，而是把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经济学门外汉亦很易上手且着迷的“小品”，促成了《魔鬼经济学》的诞生。在书中，他通过发掘许多看似幽默怪诞，却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试图帮助人们打破传统智慧的束缚，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莱维特发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像是一颗苹果，用经济学的剖刀切开，里头竟然是橘子。这种剖刀凭藉的是经济学里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从最有趣而关键的点切入。

■ 本期人物话语



本报记者 史丽 摄

中国货币政策更关注反通胀问题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5月10日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鉴于去年以来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苗头都在上升，且势头似乎来得也很猛。在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金融机构的健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等货币政策目标时，中国货币政策更关心的问题还是反通货膨胀。

■ 多声道

美国楼市按揭断供比例增加危及美国经济

伯南克(美联储主席)5月5日在一个午餐演讲中表示，住房抵押贷款拖欠还贷和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的不断上升，将对住房市场、金融市场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产生关联影响，并将对国家经济构成重大危险。鉴于房价普遍下跌，信贷服务机构需制订新的策略应付目前的局势。因此，呼吁国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帮助更多的人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不仅符合放贷者和借款人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别关注两大问题

韩正(上海市市长、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5月8日在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别关注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吸引金融人才，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最重要因素，也是上海与许多国际金融中心差距最明显的地方。二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融合共同推动的结果。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四个基本要素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5月9日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一般来讲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四个基本的要素。一、要建设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的环境。二、应当拥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一个金融市场体系。三、应当拥有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四是有一个能够凝聚和聚集一流的国际金融人才这样一个竞争的能力。

国际原油市场供应充足

巴德里(欧佩克秘书长)5月8日在欧佩克秘书处的一份发表声明说，最近几个月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这主要是由于大量的投机资金涌入原油期货市场，从而人为地炒高了油价。当前国际原油市场并不存在供应短缺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原油储备高于近5年来的平均水平，美国的原油储备上周又增加了近600万桶。这表明，国际原油市场供应充足。

中国证券市场缺乏机构投资者

麦克唐纳(美林集团副董事长)5月9日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缺乏机构投资者。在很多发达国家市场上，证券的主要购买者是机构投资者，但中国机构投资者几乎看不见，机构投资者包括年金、保险公司和基金等，在中国主要是散户(富裕个人)。但他们没有足够知识来了解哪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投资的。这是中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其中一个问题。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伍启元：学术视野开阔的经济学家

◎ 梁捷

早先，西南联大在社会科学方面出了一批出色学者。其中，就有伍启元先生。伍启元生于1912年，广东台山人，早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毕业后转入清华研究院继续攻读财政理论。

在上海和北京求学时，伍启元已观察和研究当时社会思想动向，并撰写了大量文章与论著。其中，他写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在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此书大体勾勒出了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实验主义、疑古思潮、整理国故、唯物辩证法以及东西方文化争论的主要发展脉络与主旨，是较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本著作，在当时影响也较大。两年后，陈瑞志曾出版过《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一书，其中有很多观点与伍启元的著作不谋而合。

1934年，伍启元参加了第二届中英庚款考试，并顺利考上了公费博士生，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中英庚款是受中美庚款活动的启发，中英庚款的目的是“培养学术高深的人充实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但持续时间和规模不能与后者相比。从1933年到1947年，当时先后选派了9届共193人赴英国留学。在当时英国学风对严谨的熏陶下，确实培养出一些有成就的留学生，钱锺书和钱伟长等皆为其中翘楚，经济学一中最有突出的就是伍启元。

伍启元在英国读书时，学习甚为用功，写成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回国前已交付伦敦大学出版，这样的成就为当时留学生中比较少见。回国后，伍启元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经济系就职。不久，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伍启元随全校师生远赴云南，并成为昆明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教师。

三校合并后，西南联大的经济学教师阵容十分强大，有陈岱孙、赵超构、周炳琳、伍启元、萧蓬和秦瓚等人，陈岱孙为总负责人。当时，所有教师都各尽所能地帮助学校的学科建设，伍启元也捐出了他在英国采购的大量图书，成为资料室藏书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家何炳棣当时正在西南联大读书，自称从伍启元捐出的西文资料书中获益极大。

伍启元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国际经济政策”课程，同时涉及当时中国经济。因为，他阅读广泛，腹笥甚丰，谈起经济政策总是旁征博引。只是他广东口音过重，字音难辨，学生很难记录笔记。授课之余，伍启元对现实经济和政治仍保持高度关注，并在各大报刊上撰写文章，批评当局的各项不当经济政策。

随着抗战深入，经济日益紧张，通货膨胀也露出苗头。1942年5月，由伍启元牵头，联络了李树青、沈来秋、林良相、张德昌、费孝通和戴世光等社会科学家，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的长文，呼吁政府尽快尽力解决物价的问题。他们警告说，“出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因此，“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持续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莫及”。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可当时通货膨胀并没有被压下来。1944年5月16日，伍启元与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等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以及在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伍启元与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物价及经济问题》。通过这一系列文章，伍启元在学界和民间都获得了很高声望。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同学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四人讲演时事。其中，伍启元主讲当时经济和政治热点。他认为，抗战方息，不能再有内战了。“一为今日国力及财政言，或从经济建设言，均应极力避免内争；一为内争之办法，在经济方面必须行民生主义。”

抗战之后，伍启元继续在清华执教，同时开始参与创办一本杂志，这就是后来影响很大的《观察》。这本杂志是由当时重庆一本名为《客观》杂志脱胎而来的，主编为储安平。伍启元从一开始就是《观察》杂志的积极参与者，以至于有媒体误以为他是主编。在《观察》杂志第一卷上，伍启元发表了“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一文。伍启元一反当时的“战后乐观情绪”，认为中国经济实际已处于崩溃边缘，“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警察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历史果真被伍启元不幸言中。

■ 来自日内瓦

东欧：瑞士私人银行业务新天地

◎ 徐千惠

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私人财富管理在如今东欧国家已成为一个大热点，吸引了各大资产管理机构纷纷进驻。其中，就有瑞士的私人银行。

作为瑞士历史上最悠久的一家私人银行，Lombard Odier Darier Hentsch & Cie (LODH)去年秋天在布拉格市开设了一个代表处。与瑞银集团或花旗集团等综合性大型银行不同，LODH的业务范围仅仅是管理私人财富。以无限公司体制注册的私人银行，注定了类似LODH的瑞士私人银行在投资策略选择上都比较谨慎。

最近，瑞士私人资产财富管理市场出现一次“地震”。首先，各大私人资产管理机构经历并目睹了市场变化，面临了来自客户个性化要求对银行的挑战；其次，市场竞争对手不仅局限于瑞士本土一些私人银行，而且

还有一些国际巨头如花旗集团和汇丰银行等。比较而言，国际化大型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而且还提供了国际化网络服务，小型的瑞士私人银行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再次，东欧地区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在不断增加且蓬勃发展。

当然，就银行的具体服务及管理来讲，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相比，东欧市场还有很大区别。

今年第一季度，斯洛伐克每人每月平均工资只有700欧元。也就是说，大多数东欧居民还不具备在国外私人银行开户条件，也没有私人财富管理的理财需求。不过，目前东欧国家的富裕个人(大多数为企业家)比重在逐渐增加。例如，截至2006年末，波兰拥有的百万富翁以欧元为单位人数约为54000人。

针对东欧国家富裕个人人数的不断增加，瑞士私人银行将开发东欧

国家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视为当务之急。当然，由于至今许多东欧人仍习惯于将自己的个人资产沉淀在储蓄账户中，如何说服东欧国家中富裕个人去信任一家外国私人银行，并委托瑞士私人银行管理他们的个人财富，对瑞士私人银行而言是一种挑战。

就LODH而言，它更注重从中期或长期策略来开发东欧私人财富管理市场，而不是急于在短期内赢得这一市场份额。为此，目前LODH先在布拉格开设了私人银行业务代表处，以期进一步地了解当地市场情况，并为今后开发东欧国家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打下一定的市场基础。

尽管如此，但从国际公约的独立财务顾问(CIFA)今年4月在捷克第六届年会上再次确认的信息来看，东欧国家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因此，东欧国家的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已成为瑞士私人银行拓展新业务的理想天堂。